

中国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村庄基础分析

——以专业村为研究对象

夏柱智¹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是发展特色农业、推动产业振兴。通过广泛的调研发现其村庄基础是面向区域或全国市场的、以农特产品的规模生产为内容的、高度组织化的专业村。其重要意义是村庄以整体化的、能动的方式吸纳市场, 自下而上构建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 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专业村发展的机制可分三个层面: 产业能人带动、村社集体统筹、地方政府推动, 组织层级越高、影响越大, 使特色产业扩大到村镇、甚至县域。地方政府应该重点扶持专业村, 注重村庄内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避免行政主导的资本下乡或者对集体、农户进行严苛考核, 造成产业发展内卷化困境。

【关键词】: 专业村 农业产业化 小农户 基层市场 产业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0)10—0163—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发展特色农业属于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对象。中共党的十九大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2019年6月, 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事实上, 在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下, 中国农村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已经有40年, 在不少地区取得了成功, 使亿万农民摆脱了传统农业束缚, 在市场中获得收入提升的机会。如何从已有的特色农业发展历程中探索经验机制及形成理论框架, 是本文问题意识来源。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带动小农户。主流观点寄希望于通过工商资本带动农户, 形成“公司+农户”或者“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1]。这种路径的问题是很容易演变为“亮点工程”, 存在工商资本和小农户的不平等, 普通农户被边缘化问题^[2]。近年来提倡组建合作组织的观点越来越多^[3], 然而很多研究表明合作组织存在很多问题,^[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村社集体可以带动小农户实现产业化。^[5]问题是村社集体发挥作用的路径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上述研究有两个方面的推进空间: 在研究对象方面, 已有研究往往注重对产业发展的个案或者比较研究, 而忽视了个案背后的村庄性质及村庄吸纳市场的过程, 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 村庄和市场的关系如何? 在研究框架方面, 已有研究习惯于提炼某一个路径或机制, 而忽视农业产业化是多种路径和机制的相互耦合过程, 其耦合机制是什么? 基于全国范围内的多点调研, 笔者发现产业规模集聚的专业村是农业产业化的组织载体, 也是社会基础, 因此把“专业村”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回答的问题包括: 专业村的特征如何、专业村对于特色产业发展的意义何在、专业村的运行机制和条件有哪些等。

作者简介: 夏柱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基金“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渐进城镇化模式研究”(413000026)。

在特色农业发展进程中，由广泛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专业化生产一直是重要特征^[6]，主要体现为专业村现象。目前的研究主要采用农业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专业村被视为农业产业化、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路径^[7]，社会学研究不足。

这源于社会学较注重对农民非农化、市民化趋势及其村庄社会影响的研究，不太注重对农业变迁的社会影响的分析，村庄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人口流入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村庄和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村庄^[8]。依据农业繁荣程度，中西部村庄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农业凋敝的村庄和农业仍然繁荣的村庄。农业凋敝的村庄是主要种植传统作物的、低度市场化的村庄；农业繁荣的村庄则主要种植经济作物、高度市场化的专业村。分析这类村庄，必须引入农民和市场关系的分析视角。从社会学角度，专业村是农民和市场互动形成的，发挥引导、组织农户进入市场的作用，小农户成为利用各类资源主动进入市场、获得利益的能动主体，而不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边缘群体。由此，专业村发展的社会学意义凸显。本文资料来自笔者及研究团队近年在全国范围内农村的调研，调查村庄主要包括：种桃的北京黑村、种梨的北京豆村、种西瓜的湖北黄村、种中药材的安徽东村、种脐橙的江西龙村。

二、专业村的由来、特征和意义

（一）专业村的由来和特征界定

专业村是八十年代就有的农村产业发展经验，最早出现于 1982 年《农业经济问题》的一篇论文^[9]。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农作物的种植及出售是国家行政指令调配的，村集体及农户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都很少。改革开放之后，以实行家庭承包制为起点，国家逐渐退出农户微观经济领域，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专业村快速兴起和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特色农业，还表现在工副业。2000 年之后，在人财物流入城镇背景下，大多数农业地区村庄普遍衰落，逐渐“空心化”，这些专业村逆势而行，以产业优势维持了村庄繁荣。

各区域都能发现这样的村庄，本文的案例村庄均是 20 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农业种植结构转型的专业村，其成长过程一般 5-10 年。专业村现象往往扩散到区域，形成了专业镇、专业县现象。形成了地域性的社会分工和著名品牌，如寿光蔬菜、赣南脐橙、宁夏枸杞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改变了食物结构，更少地吃粮食，更多地吃蔬菜、肉类和水果，催生庞大的市场需求，推动农业种植结构转型。从社会学方面，要理解特色农业发展，还要回到特色农业的基层单位：专业村。从主要特征来界定，专业村是面向市场的、以农特产品的规模生产为内容的、高度组织化的村庄。特色产业发展是专业村带动周边农户，形成专业镇、专业县的过程。

其一是高度的市场化。专业村的农户经营的是农特产品，就是“经济作物”，如瓜果蔬菜，市场价格一般较粮食作物高，也因缺乏市场保护，有较高风险。种植农特产品的农户，因此是高度卷入市场的农户，和种植粮食作物的“半市场化”的农户不同。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产业链延伸，专业村不仅生产农特产品，而且形成了各类配套的生产服务业，如随着农村电商发展形成了便捷的物流服务，让村庄获得更多利润。

其二是农特产品的规模经营。只有形成了规模经营，专业村才有实质的内容，也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加入农户越多，经营规模越大，专业分工就会越深入，产业就越有竞争力，从而有可能形成全国或者区域性的农产品品牌。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专业村及附近农户产业同质性越来越高，在笔者调研的多个专业村，目前 80% 以上的农户种植一种作物，特色农业全部扩展到镇域，部分扩展到县市，形成了区域性的农业产业化现象。

其三是村庄高度的组织化。相对于松散的、日益原子化的农业型村庄，强组织性是专业村的典型特征。高度组织化的根源在于农户拥有基于产业化的共同利益，因之要求形成特殊的地方性规范共识，规范村庄内部的生产及市场秩序，形成“经济共同体”。这是社会学最关注的特征。农户组织的规模是不同的，有可能是熟人朋友范围的非正式的组织，目的是更快地销售农产品，也有可能是村社集体范围的组织，组织起来提供一项公共服务，还有可能是地方政府推动形成的大范围组织，如建立一

个现代的农批市场等。专业村的形成最初是从非正式组织开始的。后文将详述。

(二) 专业村和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

专业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导和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在于塑造了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这是中国特色的农业产业化路径，也将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主导型路径。

特色农产品的生产者主要是小农户，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专业村的经济和社会主体。农户主要投入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主要集中在种植环节。在几个村庄中，水果的亩产值是最高的，1 亩最高达到 6 千到 1 万元，京郊地区一个农户种植五六亩果园，获得五六万元的纯收入，相当于租种 100 亩粮食的家庭农场收入，这对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生计模式使传统小农成为“新中农”，实现了农民在地化就业，免于进城务工经商造成家庭代际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空间隔离。

特色农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瓜果蔬菜等作物的种植是农户可以发挥家庭经营优势的领域。家庭劳动力投入是不计成本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换工”也是不计成本的，形成集体劳动带来的效率。比如说桃的疏蕾、疏花、疏果，是非常枯燥的手工劳动，亲戚朋友之间就发展出互助关系。比较而言，农业的雇工经营是没有效率的。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小农户在加工、销售和物流等不需要大量投资的、可以细分的环节，都占据了主导地位。有学者观察到工商资本进入特色产业造成了新的不平等^[10]，这需要分条件。从经验研究来看，特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企业的参与，农业企业解决一些技术和市场问题，理应获得相应的市场利益。在农业企业参与的过程中，小农户的利益也在不断增长。比如说农业企业带来更为先进的种苗，更能适应市场需求。这种合理的社会分工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农户的主导地位。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产业化政策一直以来的目标，也符合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户收入增长的政策诉求。

专业村作为中国特色的基层农业组织方式是农民和市场密切互动过程的产物。从性质来看，面向市场从事特色农业经营的专业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村庄，而是高度现代化的、卷入农产品市场的村庄^[11]。本村和附近村庄农户均通过这个村庄和外部市场打交道。一方面把生产的特色农产品出售到外部市场，另一方面了解外部的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特色农产品供给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特色农业，专业村由此扩张形成了专业镇、专业县，不断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接下来的研究任务是具体地解剖专业村组织起来的过程，提炼微观机制，并应用于专业村的建设中去。

三、专业村的组织主体和组织机制

专业村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也因此分解为多种类型，其共同的特征是面向市场进行高度组织化的农业规模经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专业村是产业分工和区域分工的结果，其经济的本质是以村庄为基础的、节约交易费用的“中间型组织”^[7]。从社会学的角度，需要阐释的是农业组织的机制，排除影响专业村的那些特殊的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资源条件，从深层次解释低交易费用的社会机理。从组织主体和组织机制的角度，专业村至少包括三个形成机制：产业能人带动、村社集体统筹和地方政府推动等。这些机制相互耦合、交互作用，发挥了组织和服务小农户的作用。

(一) 产业能人带动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普通农户的广泛参与，也离不开一些分化出来的产业能人。他们也是最早的产业“专业户”，一般的农户是由这些产业能人带动加入特色产业的。产业能人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部分还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指的是任村干部。产业能人一般有更多的资金，他们可能就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尤其是在城市创业或者担任管理岗位的精英农民工；也有可能是在长期的农副业经营中积累了资金，他们从年轻时就胆子大，敢于率先冒险种植经济作物，获得较多的收入。产业能人的社会资源也很重要。在小规模经营的前提下，经济作物种植的主要制约是销路问题，产业能人一般信息多、关系广，

率先掌握了市场渠道。当产业能人通过发展特色农业获利时，普通农户就顺理成章地调整种植结构，对于他们而言，眼见为实是最重要的。

在社会分工细化的条件下，农业产业化领域不断扩大，产业能人的类型更为多样化，包括种苗培育者、规模种植者、销售经纪人、加工服务者、物流服务者等等类型。每一类产业能人都有其产业方面的优势，而且这些产业优势是可以叠加的。在赣南脐橙专业村，产业能人承包荒山种脐橙，规模可以达到上百亩。他们也同时是各类中小脐橙加工厂（选果、打蜡、包装、冷藏）的投资人。还可能兼做脐橙代办，利用本地能人的社会资源优势，为外地商贩组织采购农产品。产业加工也快速专业化了。在湖北茶叶专业村猫村，随着茶叶种植规模扩大，本村产业能人自 2003 年开始建立加工厂就地收购、加工鲜叶，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茶叶附加值。到 2013 年猫村就有 6 家工厂，不仅是茶叶生产大村，更是茶叶加工大村，促进了茶叶产业化。

产业能人带动小农户的动力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亲戚朋友，有义务分享市场机会，带动共同致富，农民的经济行为是有伦理连带性的；二是扩大产业规模有利于增加产业能人自身收入。相对于外来的农业企业，本村产业能人和小农户的关系具有更强的互惠关系特征。产业能人带动小农户的同时又依赖小农户。由于市场需求的波动性，他们必须要和本地农户搞好关系，作为稳定的生产基地和服务对象。

（二）村社集体统筹

村庄集体不仅具有国家制度安排确定的体制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还嵌入乡村社会，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集体既在村民小组基础上存在，还表现在行政村层面上，既具有治理基层社会的功能，还具有一定的经营功能，这增加了基层乡村的组织能力，成为了农民和市场的天然中介。

在特色产业化发展的早期，村社集体服务于专业村建设的路径是直接示范。村集体利用机动地或者动员少数农户试种经济作物，做一块“示范田”。主要看本地的气候、土壤等条件是否适合种植该种特色作物，看种植技术过程如何，还看这种经济作物的收益，如果可行就逐步扩大经营。村集体直接示范是培育产业能人的重要路径之一。当产业发展起来后，村集体退出直接经营领域，转而为农民提供一家一户不好办、办起来缺乏效率的村内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整合细碎化地权、提供社会化服务、建设村级市场等。种植农特作物需要成片土地，便于管理，农户之间的互换并地效率低，需要村社集体及时介入。在京郊黑村，九十年初期村集体就采用土地连片承包经营的做法，一个农户一块地，有利于桃园的灌溉、防盗、果品运输等。生产管理上的服务需要农户及市场性服务组织，必要的时候也需要村集体。黑村和豆村均在 2000 年左右就建立了村级合作社，合作社从农户和集体筹资资金，然后利用政府项目补贴建设村级交易市场，吸引附近村庄农户到此交易。通过合作社统一销售的水果质量好、价格高，具有品牌效应，给农户带来长期效益。梨专业村豆村还雇佣团队摄制“佛见喜”梨的品牌宣传片，这都是有利于打开市场的公共服务。

村社集体统筹的动力包括三个方面：建设专业村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路径，只有把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规模经营，才能吸引外部客商收购农产品。专业村可以实质性提升集体和农户收入，其中村集体收入来自于市场摊位租赁收入及政府奖补资金收入。专业村发展还可以增加干群的关联度，优化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村民自治组织不仅要配合上级组织完成行政任务，还需要组织农民进入市场获得更多农业收益。

（三）地方政府推动

在专业村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保持推动力。地方政府拥有经济的、政治的资源。在项目资源大量下乡的背景下，县乡两级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可用于支持专业村建设。政治资源指的是，地方政府拥有深入基层的组织网络，一旦特色产业发展被作为“中心工作”，则可把产业发展作为考核基层干部的重要方面。这尤其表现在近年的脱贫攻坚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了高度动员的政策执行方式^[12]。

地方政府服务于专业村建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建设区域性的镇级、县级“专业市场”，为专业村的成长和进一步扩散提供条件。在产业扩大的背景下，一般是通过招商引资吸引龙头企业进驻，为更多村庄成长为专业村提供市场条件。在农业产业化的区域竞争中，龙头企业有时是决定性的。二是通过行政考核的方式形成基层动员。湖北省黄村所在的流水镇是有名的西瓜专业镇，西瓜产业自1992年开始，1996年西瓜面积达到1万亩。1998年，乡镇规定村干部工资的40%和西瓜面积挂钩，激励村干部推广西瓜，对农户规定凡是多建1个西瓜大棚就免除1年的义务工，当年面积达到3万亩。三是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包括技术、治安、市场、环境卫生、质量监测、金融等公共服务，这是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四是通过驻村干部提供精准帮扶。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相对于地方政府的帮扶，驻村干部长期联系蹲点村庄，可以利用专业技术、联系企业及政府资源，为帮扶村庄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县乡政府的动力包括多个层面：首先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考虑，在原来西瓜特产税是基层县乡重要财政来源。1996年，流水镇就从1万亩西瓜中获得了50万收入。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户不再缴纳特产税，然而特色产业的发展可以吸引大量的项目投入，这是地方政府运转的经济基础。另外产业化本身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一旦建成就具有很强的辐射性，是政绩的亮点。再次是农村社会稳定的考虑。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户收入和农村集体收入，有利于增加村级治理能力和稳定水平，专业村的发展和村级治理能力提升是同时发生、相互作用的。

四、产业振兴的误区：两种脱嵌的产业化

专业村是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化或者说产业振兴的村庄基础，专业村建设的路径也具有中国特色，村庄产业能人、村社集体及地方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推动特色产业。笔者近年田野调查，还发现了一些地区在推动农业产业化时落入两个误区，呈现出行政主导带来的“脱嵌”的产业发展困境^[13]，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极为不利。其中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政府推动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土地，这是一种排斥小农的产业化。另一种普遍的做法在自上而下的考核压力下，一刀切地要求集体和农户发展产业，造成了形式主义问题。地方政府应当理解特色产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大干快上可能得到负面后果。

（一）垒大户：排斥性的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需要规模经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一些地区需要引入农业资本带动特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14]。出于政治上出政绩和治理上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15]，一些地方政府放弃了组织农民，转而单纯地引入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整理、农业项目、租金补贴等。为了推动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土政策”强制、半强制地流转土地，把农户排斥出特色农业。

鄂西山区青村是省扶贫试点，政府推动新型烟叶种植，引入县烟草公司驻村帮扶。为了完成当年行政考核，烟草公司下乡流转农户土地，建立农业企业。2013流转了1600亩，土地分包给14个种植大户。农业企业提供烤房、烟苗、农资，公司按照市场价收购烟草，并在结算时扣除这些成本费用。种烟大户收入提升到10万元以上。然而从农户的角度，这样的农业产业化是只见“产业”不见人，是排斥性的农业产业化。按照设想，烟草公司流转土地之后，农民可以获得多样化的收入：租金收入、务工收入、入股收入。这是过于理想化的经济账，并不符合当地现实，排除实际上不存在的入股收入，其一，该地区农村大多形成了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土地虽不多，户均不过8亩，却能够维持温饱的生活。这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农民要么种植烟叶要么种植传统作物，维持生计。土地的长期限流转带来农户被动失地问题。其二公司及种植大户吸纳的劳动力不足，农民到企业打工是季节性的，大户经营烟草，雇佣的是相对年轻的劳动力，老年人缺乏就业机会，收入和生活水平是下降的，隐性失业面临公开化。

这种政府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的“垒大户”的农业产业化政策误区，值得警惕。十九大报告提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如何对接的命题，正是针对这种误区，无论如何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把小农户排斥出农业产业化，把收租金或雇工作为“对接”的方式，否则就背离了产业化的初衷。

(二)下指标:应对考核的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推动,却也经常遭受自上而下的下指标、瞎指挥的困境。近期笔者发现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产业脱贫这项硬指标成为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事情。面对自上而下的考核,地方政府把财政资金拨付到村庄,要求必须发展产业,而且对产业发展的方式有非常严苛的考核,形成了产业发展指标化误区。

脱贫攻坚背景下,产业发展成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扶贫资金是村村都有的,然而未必村村都有条件发展产业。如鄂东某镇 2015-2019 年,每年到村级的扶贫资金有 20-30 万元,这些产业扶贫的资金必须用下去。然而这并非村庄内在的需求,有的村庄完全没有任何产业基础,也被迫去投资,大部分必然是失败的。由于扶贫资金的政治性,产业扶贫不能亏,每年的扶贫资金利用审计也促使基层政府和村庄审慎。某村 2016 年的集体雇贫贫困户养羊的产业项目失败了,亏掉 40 万元,村支书被问责,类似的失败案例促使上级政府反思,转换产业发展的思路。于是大量的资金被入股到当地农业企业拿“分红”,或者投资国家大力支持的光伏产业,或者用于苗木这一长期作物。由于分红比例高,农业企业实际上是被要求配合地方政府完成产业扶贫任务。由于村级光伏发电出售价是市场价的二倍多,光伏产业完全是国家补贴支撑的,这也算是完成产业扶贫任务。最后一类则是基层镇村的变通。苗木三五年内没有效益,然而也不能算是亏损,因为并没有进入市场,符合迎检需要。从市场角度,集体经营是无法和私人竞争的。这种产业发展完全是为了应付考核需要,并不以产业本身发展为目标,产业发展本身成为了“形式”。

调查发现,这种指标化的产业化发展误区不断蔓延,也是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首先是内生的,而不是靠上级政府财政资金扶持形成的。若沿用这种方式对待未来的产业振兴,则造成大量财政资金浪费。政府有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义务,然而很难用行政考核的方式要求组织。产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产业化发展首先是农户、农村集体自己的事情。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业产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中国基层普遍是村庄社会的前提下,农业产业化发展本质上要处理好农户和市场关系,这就要充分认识基层普遍形成的专业村现象。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农户占大多数的广大中西部农村,“专业村”是特色农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专业村发展不排斥龙头企业及专业农业合作社的带动。其独特性在于,专业村的社会基础是小农户,又服务于小农户,具有面向市场、规模经营和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其重要意义是通过自下而上地吸纳市场,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路径。从组织主体和机制的角度,专业村的发展是三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产业能人的带动、村社集体的统筹及地方政府推动。从政策建议看,地方政府要警惕两种脱嵌的产业化:简单地引入工商资本推动大规模发展,或者通过下指标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需要久久为功,坚持发挥农户和农村的主体性。以专业村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经济基础,还将进一步发展,惠及广大农户。这不仅有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意义,而且有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意义,需要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陈义媛.精准扶贫和农业产业化双重背景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困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2):6-10.

[2]陈靖.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基于皖北 T 镇两个村庄的对比[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1-39.

[3]海莉娟.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及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12):154-160.

[4]冯小.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4(2):2-8

-
- [5]孙新华, 曾红, 周娟.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小农户的命运与出路[J]. 农村经济, 2019(9):33-41.
- [6]王留鑫, 何炼成. 农业专业化分工:研究进展与述评[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7(3):293-300.
- [7]石大立, 汤钦乐, 叶玉琴. 农业专业村发展动力的理论探讨:基于分工的角度[J]. 南方农村, 2014(5):21-23.
- [8]贺雪峰. 论中国村庄结构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J]. 学术月刊, 2017(6):111-119.
- [9]黄羽新, 陈炜. 近三十年来中国专业村研究述评[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0(5):78-82.
- [10]武广汉. “中间商+农民”模式与农民的半无产化[J]. 开放时代, 2012(3):100-111.
- [11]贺雪峰. 三大全国性市场与乡村秩序[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1):38-43.
- [12]邢成举. 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与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65-73.
- [13]赵晓峰. 地方政府在农业转型中的规模依赖行为分析——兼论小农户的发展困境及其超越[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6-15.
- [14]王海娟. 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农民组织化视角[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6):163-168.
- [15]孙新华, 钟涨宝. 地方治理便利化:规模农业发展的治理逻辑——以皖南河镇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3):31-37.